

李学勤 主编
孟世凯 副主编
田旭东
周苏平 著
王美凤

- 一 绪论
- 二 平王东迁后的政治形势
- 三 霸主政治的兴衰
- 四 公室与私家势力的消长
- 五 盟誓制度
- 六 军事制度
- 七 世官制度及其变革
- 八 国野制度与村社组织
- 九 农业发展与土地制度的变化
- 十 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
- 十一 社会生活
- 十二 各族关系与《华夷之辨》
- 十三 区域文化特质
- 十四 春秋时期的土
- 十五 法律制度的变化
- 十六 思想文化的过渡性质
- 十七 孔子及其学说
- 十八 老子及其学说
- 十九 科学与技术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目 录

1 绪论 /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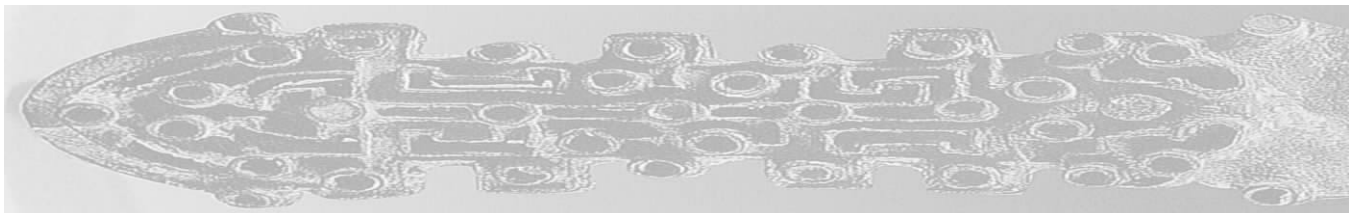
- 一 “春秋”名称的由来和春秋史的起止年代 / 1
- 二 春秋时期历史文献 / 3
- 三 春秋时期考古发现及其整理 / 10
- 四 二十世纪春秋史研究述要 / 17
- 五 春秋时期的主要特征 / 50

2 平王东迁后的政治形势 / 55

- 一 周王室丧失控制权 / 55
- 二 春秋初年各诸侯国的内乱和纷争 / 58

3 霸主政治的兴衰 / 65

- 一 齐桓公首霸中原 / 65
- 二 宋襄公图霸 / 69



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

春秋史与春秋文明

- 三 晋文公称霸 / 69
- 四 秦穆公独霸西戎 / 72
- 五 楚庄王问鼎中原 / 73
- 六 “弭兵”运动 / 74
- 七 吴、越争霸 / 76
- 八 大国争霸的实质及其意义 / 77

4 公室与私家势力的消长 / 79

- 一 三桓专鲁 / 79
- 二 田氏代齐 / 81
- 三 三家分晋 / 82

5 盟誓制度 / 86

- 一 盟誓的历史源流 / 86
- 二 盟誓的礼仪 / 91



三 盟誓的社会功能 / 96

6 军事制度 / 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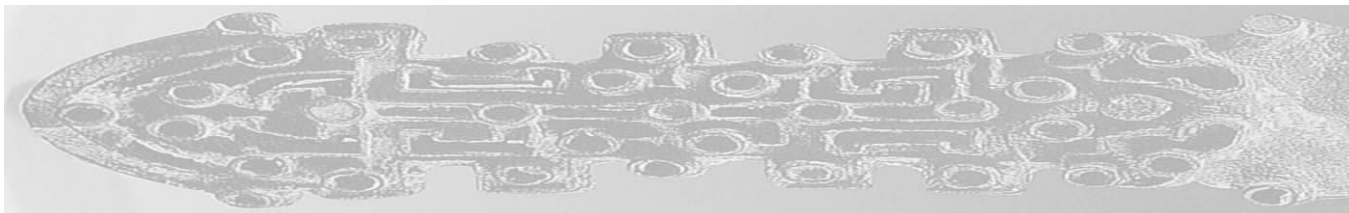
- 一 军队组织 / 103
- 二 作战方式 / 107
- 三 军事制度的变革 / 109

7 世官制度及其变革 / 114

- 一 宗族体系与政权组织 / 114
- 二 宗族政治与贵族世官制度 / 116
- 三 宗族政治的瓦解与官僚制度的出现 / 122

8 国野制度与村社组织 / 129

- 一 春秋列国的拓疆活动 / 129
- 二 县的设置 / 131



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

春秋史与春秋文明

三 村社组织的变化 / 133

9 农业发展与土地制度的变化 / 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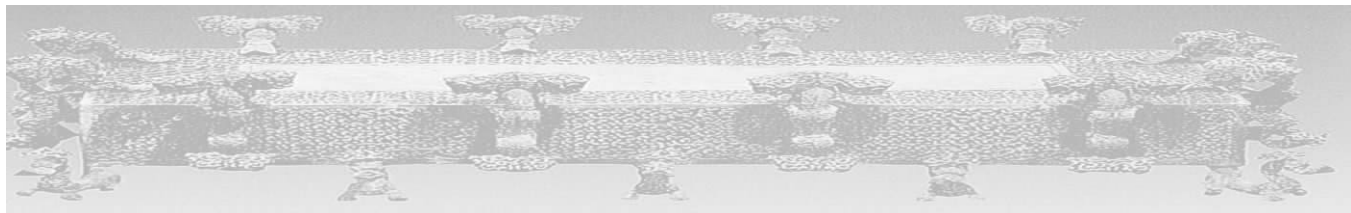
- 一 铁器的出现和推广 / 138
- 二 耕作技术的进步和兴修水利 / 141
- 三 井田制的演变 / 143

10 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 / 150

- 一 铁器与青铜铸造业 / 150
- 二 玉石器、漆器和纺织业 / 157
- 三 手工业官营、私营制度 / 159
- 四 商业和金属货币的发展 / 162

11 社会生活 / 167

- 一 衣食住行 / 167



二 婚姻礼俗 / 177

三 城市生活 / 182

12 各族关系与“华夷之辨” / 188

一 各族分布 / 188

二 华夷关系 / 196

三 华夷之辨 / 199

13 区域文化特质 / 202

一 齐文化 / 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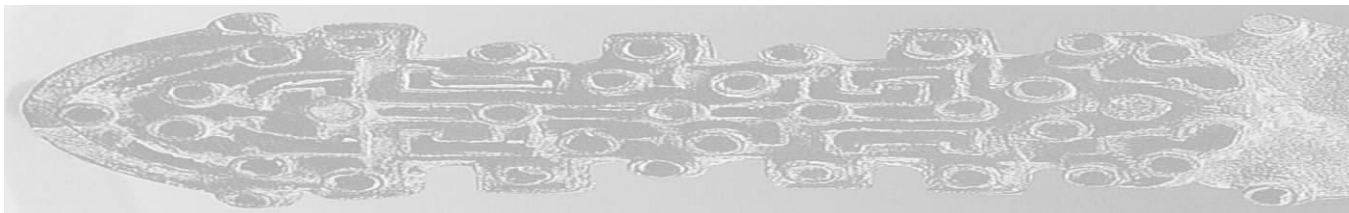
二 鲁文化 / 206

三 楚文化 / 210

四 秦文化 / 212

五 晋文化 / 215

六 吴越文化 / 218



14 春秋时期的士 / 222

- 一 士阶层的出现 / 222
- 二 士的职守 / 226
- 三 士的特点 / 228
- 四 士与“五霸” / 229

15 法律制度的变化 / 232

- 一 各派法律思想的出现 / 232
- 二 春秋时期公布成文法的活动 / 236
- 三 公布成文法引起的争议 / 238
- 四 成文法公布的意义 / 242

16 思想文化的过渡性质 / 243

- 一 官学与私学 / 243
- 二 “天人之辩”思潮的兴起 / 244



- 三 朴素辩证思维的发展 / 247
- 四 “气”的学说雏形和“物精”说的出现 / 249
- 五 礼治思潮 / 250

17 孔子及其学说 / 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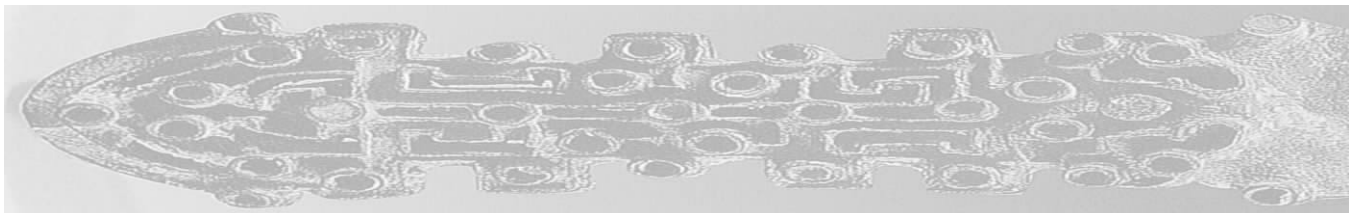
- 一 孔子及其生平 / 256
- 二 孔子及其思想研究状况 / 257
- 三 孔子的思想内容 / 259

18 老子及其学说 / 268

- 一 《老子》的成书时间及思想源流 / 268
- 二 《老子》思想学说 / 273

19 科学与技术 / 2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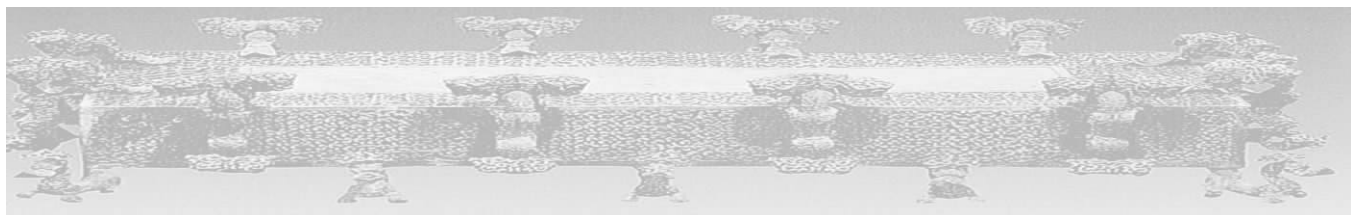
- 一 天文历法的进步 / 281



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

春秋史与春秋文明

- 二 数学方面的成就 / 284
- 三 物理学知识的产生 / 286
- 四 医学的发展和传统医学理论的确立 / 287
- 五 地理学的初创 / 289
- 六 第一部总结手工业技术的专著——《考工记》 / 290





1 绪 论

一 “春秋”名称的由来和春秋史的起止年代

春秋时代是因鲁国史书《春秋》而得名。当时鲁国史官记录鲁国以及各国发生的大事时,是按照年、季、月、日记录的。因为一年中有春、夏、秋、冬四季,而又以春秋二季最为重要,如《周礼·地官·州长》、《左传》僖公十二年等,都以春秋时节为朝聘、聚会时节,故以春秋代表一年。以“春秋”二字命名的史记,就表示逐年记载四季之事。当时,不止一国的史记以“春秋”命名,如《墨子·明鬼下》说:“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孙诒让的《墨子间诂》记述《墨子》佚文称:“吾见百国《春秋》。”可见“春秋”是当时各国史记的通名,可是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鲁国的《春秋》。

《春秋》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历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共二百四十二年间的的大事。其所记大事,大体上与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定发展时期相当,加之《春秋》在中国

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故历代史学家便把《春秋》这个书名作为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名称——春秋时期。

关于春秋史的划限,历来较有争议。有人依据《春秋》来划限,从公元前722年叙述到公元前481年孔子绝笔,如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有人依据《左传》划限,由公元前722年叙述至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如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有人则依据《左传》续文划限,由公元前722年叙述到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智氏,如马骥的《左传事纬》。

20世纪40年代,童书业编著《春秋史》时,沿用了《左传》的纪年方法,将春秋史的起止时间定为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73年;吕思勉编著《先秦史》时,将春秋史限定在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81年;钱穆的《国史大纲》则定在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之间。

50年代以后,范文澜修订《中国通史简编》时,将春秋史的起止时间定在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之后,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将春秋时代的上限定在公元前770年,下限则依《史记·六国年表》,定在公元前的476年。此后,郭沫若在其《中国史稿》一书中沿用了这一分期方法。上述两种分期方法是目前最为通行、影响也最大的两种分期方法,范氏的分期方法在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白寿彝的《中国通史纲要》、张传玺的《中国通史讲稿》等多部著作中被采纳,郭沫若的分期方法则在目前我国大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以及各种历史普及读物中被广泛采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以上两种分期方法提出了异议,如金景芳在《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下)》^①一文中提出以公元前453年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线,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罗勇在《春秋战国史断代新议》^②一文中通过分析春秋战国时

① 金景芳：《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下)》，《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

② 罗勇：《春秋战国史断代新议》，《中国史研究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期的时代特征,结合大量的先秦史料,亦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以公元前453年韩、魏、赵三家灭智氏,秦、楚、齐、韩、赵、燕、魏七国并存局面的形成作为战国时代开始。以公元前476年作为分界线,没有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志,不符合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故而缺乏科学性。而公元前453年的三家灭智氏而分其地之年,也是七国并立局面大致形成之年。同时,三家灭智氏之年也是《左传》记事的下限,以这一年作为分界线也与中国古代史学家们自觉以历史事件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准相吻合。所以,我们认为以公元前453年作为分界线比较合理。此外,这一分期方法,也因其本身的合理性、科学性而成功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史学界因采用传统分期方法所引起的自相矛盾,从而也证实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所以,我们同意将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53年作为春秋时期的起止年代。

二 春秋时期历史文献

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之中,修史活动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年代。传说三皇五帝时代就已经有了典籍,称作“三坟”“五典”,黄帝时代就有了名为仓颉的史官。这种传说虽然不能尽信,但至少可以说明修史是和文明与生俱有的一种活动。中国古代史官设置之早、职位之高,都为中国古代史家的诞生与史学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从可查寻的文字资料看,历代统治者都设有掌管史料、记载史事、撰写史书的官员。商朝称作册,周代有大史、小史、外史、御史等职。北宋文史名家曾巩说:古代史官,必选“天下之才”而“圣人之徒”^①。由于史官的职责是历记古今成败祸福及存亡之道,以辅佐统治者治理天下,这就要求他们博闻强记,疏通知远,而又中正不屈,直书其事以为惩劝,即有才、有学、有识、有德。所以,秉笔直书、书法不隐、疑则不言等成为历代史家必须遵从的修史原则。近年来一些新发现的考古资料也证明古代

^① 《南宋书·序》。

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

春秋史与春秋文明

史官在记史的同时又兼负褒贬、惩劝的作用,如1980年在陕西长安(今西安长安区)沔西出土的史惠鼎,其铭文就表明至少在西周晚期,史官就以教善为己任了^①。

我国修史活动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传统,就是历代对“史鉴”的重视。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无不都是以为“鉴形莫如止水,鉴败莫如亡国”^②,而要吸取兴亡治国的经验教训为本朝服务的。《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这种“史鉴”态度促使历代统治者都对修史活动极其重视,并对修史者有着严格的要求,于是便有了《左传》中“赵盾弑其君”而孔子为之申说、齐太史冒杀头之险直书崔杼弑君的故事。这些被后人称为“良史”或“史德”的原则,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为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书提供了坚实的可信性。

春秋时期,在官修史书的同时,又涌现出了私人的历史撰述;在编年体史书和记言体史书逐渐成熟的同时,又出现了纪传体以及典制体的萌芽,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开始迈向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一)《春秋》与《左传》

《春秋》,又称《春秋经》,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史书,是春秋末年孔子在鲁国的国史《鲁春秋》的基础上修成的,为春秋时期各国国史的唯一幸存者,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汉书·艺文志》著录《春秋古经》十二篇和《春秋经》十一卷。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刊定石经,经文载于“《春秋》三传”各传之前。宋以后列入《十三经》。

《春秋》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历鲁国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计二百四十二年史事^③,约

^① 李学勤:《史惠鼎与史学渊源》,《文博》,1985年第6期。

^② 《资治通鉴·唐纪十一》。

^③ 今传《春秋》下迄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与《史记·孔子世家》不合,后二年当系后人所续。

一万八千余字^①。其记事形式为“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②。于一年之下标有四时,每年之始在时、月之间有“王”字,日以干支记,按年、时、月、日记事。他虽为鲁史,但所记内容还包括周王室及其他各诸侯国的朝聘、会盟、战争等政治、军事活动,以及一些自然现象如日食、地震、水灾、旱灾、虫灾等。它以鲁国为中心,把春秋一代天下大事的演变作了较全面的记载,涉及一百二十二国。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尚属首例。《春秋》讲究用词造句,力图用不同的写法和措词用字,反映出作者对有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价值认识,蕴含所谓“微玄大义”,于一字寓褒贬,被后人称之为“春秋笔法”,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它记事极其简短,每条不过四十余字,最少的仅有一字,无法给人以具体的历史知识,是为此书的不足之处。但是,作为第一部私人撰述的历史著作,它标志着史学已从官府走向了民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由于《春秋》记事过于简短,从而使历代引申解释《春秋》之书不绝,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就是一部解释《春秋》而又以记事为主的著作。

左丘明,春秋末年鲁国人,曾任鲁太史。太史之职,为记史事、撰史书,掌典籍、天文、历法之事。唐代人刘知几《史通·申左》说:“《周礼》之故事,鲁国之遗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旧制而已。至于实录,传之丘明,用使善恶毕彰,真伪尽露。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详哉!”认为左丘明和孔子二人不仅在治史观上相同,而且他同样为中国史学的创立和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之功。

左丘明的《春秋传》,虽然寓孔子之教而“不失圣人之旨”,但它所记述的范围却较《春秋》有所推广,记事之年代也较之《春秋》有所延长,可以说《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形式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其记事上溯周宣王二十三年(公元前805

^① 今传本《春秋》约有一万六千五百多字,流传中脱漏一千四百多字。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第2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 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

年),早于《春秋》记事八十三年,而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又比《春秋》记事长十三年。其书主要记述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史事及其相互关系,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以及各方面代表人物,西周时的部分史事乃至夏、商以上的古史传说也间或涉及。其取材极其广泛,对各国之旧史、故志及典、语、令、世等书均有汲取。记事以晋、楚、鲁最为详细,而郑、宋、卫、齐、秦与周王室等次之。史事记述周密而系统,以记事为主,兼记言论,文字生动而简洁,尤以记战争最为见长。它在编年记事的总格局中,有集中记一件史事本末原委的,也有集中写一个人物活动经历的。这不仅丰富了编年体史书在记事、记人方面的容量,也有助于弥补事实经过、人物活动被年代割裂的不足,同时也增强了历史表述上的艺术性。《左传》还能吸收其他史书的长处,把其他史书的史料按年代顺序组织进去,使编年体达到基本成熟的程度,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成熟的历史著作。

《左传》同时又被奉为文学名著,其叙事生动形象,文辞简洁优美,其中不乏散文名篇,广为流传,脍炙人口。唐代刘知几谓“左氏之叙事也,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①,而今人钱锺书则谓“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②。历代为《左传》作注者甚多,东汉的贾逵、服虔等人之注,今已不存。现存最早注本为西晋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唐人孔颖达为之作疏,名为《春秋左传正义》,宋以后列入《十三经注疏》之中。清代作注者及研究者甚多,顾炎武有《左传杜解补正》,惠栋有《左传补正》,沈钦韩有《春秋左氏地名补正》,刘文淇有《左传旧注疏正》等。日本学者竹添光鸿有《左氏会笺》,今人杨伯峻有《春秋左传注》等。

(二) 春秋时期的国别史——《国语》

《国语》又名《春秋外传》,相传仍为左丘明所作,由于与《左传》都为左氏所作,故

^① 《史通·杂说》。

^② 《管锥编·左传正义》,中华书局,1979年。

汉儒称《左传》为“内传”，称《国语》为《左氏外传》。全书二十一卷。

《国语》作为春秋时期的国别史，分《周语》三卷、《鲁语》二卷、《齐语》一卷、《晋语》九卷、《郑语》一卷、《楚语》二卷、《吴语》一卷、《越语》二卷，依“先王室而后列国，先诸夏而后蛮夷”的顺序编次而成。这虽然体现了崇周尊王的思想，但却能突破春秋列国国史的局限，把周和鲁、齐等七国历史会合在一起。其记事时间，上起西周中期祭公谏穆王征犬戎，下迄春秋战国之交晋国韩、赵、魏三家灭智伯氏，前后约四百多年，但基本上以记述春秋史事为重点。它以记君臣言论为主，也有一些记事，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思想、外交、军事等各方面，材料丰富，文辞雅丽。记各国之言，以晋国为最多，几乎占据全书的一半；郑国最少，仅郑桓公与史伯论兴衰一事。《国语》与《左传》同记春秋史事，内容大同小异，然而详略重点各不相同，其分国记事的体例对后世史籍的编纂有一定的影响。《国语》重人事，始于《春秋》的鉴戒史观在这里得到较大的发展。但《国语》所记各国事，起讫年代极为悬殊，这说明《国语》取材的多途与不具备严谨的体例，带有明显的资料汇编的性质。《国语》在文学史上亦有一定的影响，他对历史事件的描述、人物形象的塑造，尤其通过极富个性化的语言、刻画人物形象等，都使它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唐代刘知几于《史通》之中将史学分作六家：一《尚书》家，二《春秋》家，三《左传》家，四《国语》家，五《史记》家，六《汉书》家。可见《国语》作为最早史家分类之一的重要性。三国时吴人韦昭作《国语解》，流传至今，成为极有价值的注本，清人洪亮吉、董增龄又为之作疏。近代有吴增祺《国语韦解补正》与徐元浩《国语集解》，大体集中了清代以来学者整理《国语》的成果。

（三）先秦史学的重要典籍——《逸周书》

《逸周书》本名《周书》，《汉书·艺文志》著录归“六艺略”，言“系周史记”，列在《尚书》诸家之后。唐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同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始称《逸周书》。先秦文献如《左传》等数引其文，皆言“《书》曰”，与引《尚书》之文无区别，可见当时视其与《尚书》同为一书。其书作者不

明 盖为当时史官对朝廷大事及国君言论的记录,为我国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七十一篇,今本十卷六十篇。相传为孔子删《书》之余。各篇成书时间不一,最初编定时间之上限,自然不能超过孔子删《书》之时,书中有些篇章从春秋战国到汉代迭被引用,至唐代时,此书仅存四十五篇。晋有孔晁之注,新、旧《唐书》均载“孔晁注《周书》八卷”,即当时的四十五篇。《隋书·经籍志》却载“《周书》十卷,汲冢书”,把此书说成是西晋汲冢战国魏襄王墓的出土之物。《新唐书·艺文志》遂有“《汲冢周书》十卷”与“孔晁注《周书》八卷”并列。《宋史·艺文志》把两书合而为一,称之为“《汲冢周书》十卷,晋孔晁注”,即今所见六十篇之本。《晋书·束皙传》载汲冢竹简有“杂书十九篇”,包括《周书》。竹简发现不久,当地建有太公望碑,碑文也印有竹书《周书》,且录有一段文字。可见《逸周书》与汲冢竹书有一定关系。今本《逸周书》实际有文五十九篇,其中四十二篇有孔晁注,十七篇无注。有孔晁注之篇,当为汉代以来传本无疑;无注诸篇,当系汲冢所出古本。因为汲冢为战国晚期魏墓,所出《周书》必与传世本有所差别,今本乃二本之删合,故有《汲冢周书》之名。

《逸周书》记事上起周文王、武王,下迄春秋末年周灵王、景王,其中记述周初文王、武王、周公史迹的篇幅约占全书的五分之四。虽然其中屦有后人窜补,但大多为先秦乃至周代遗文无疑。对《逸周书》的成书年代,近年来有学者经过详细考证,认为应在春秋晚期为妥,具体时间当在晋平公卒后的周景王末世,即周景王十四年(公元前531年)至二十五年(公元前520年)之间^①。

《逸周书》自晋代孔晁为之作注以后,仅有《王会》一篇多有学者讨论,其他部分几乎无人顾及。至清代乾嘉学派兴起考据之学后,有卢文弨、王念孙等家陆续对其加以整理,以后朱右曾著《逸周书集训校释》,为集成之作。又有朱骏声、俞樾、孙诒让,以及近人刘师培、陈汉章等家,校释拾补,各有所得。近年来有学者对《逸周书》

^① 黄怀信、田旭东:《逸周书》中有关商周年代、天象及都城诸篇之可信性研究报告——“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报告之一。